

梵净山弥勒道场《敕赐碑》研究^{*}

张 明

本文根据明代贵州发生的几次重大历史事件，同时结合地方史志和碑刻文献，对梵净山《敕赐碑》进行了比较深入地考证和研究。本文指出：明代中后期梵净山地区发生一系列大规模苗民起义，促成了梵净山在嘉靖至万历年间的两次大规模重建。明王朝为稳定梵净山地区的统治，一方面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武力征剿，另一方面又在此大力推崇佛教，兴修庙宇，敕封加冕，藉以强化佛教对少数民族的教化功能。万历四十六年，明神宗任妙玄为钦命僧，重建梵净山金顶古寺，赐镇山之印，梵净山逐渐形成“一大正殿、四大皇庵、四十八大脚庵”的格局。明代梵净山佛教的鼎盛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必然结果，为清代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敕赐碑》透露以上众多历史信息，是为梵净山镇山之宝。

关键词：梵净山 弥勒道场 《敕赐碑》

作者：张明，1970年生，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历史学硕士、留美教育学硕士。

一、梵净山《敕赐碑》

在梵净山老金顶悬崖之下的明代通明殿遗址旁，耸立着一块精雕细琢的青石石碑。该碑保存完好，尚有台基、抱鼓碑柱，通高290厘米，碑面高185厘米，宽151厘米，两侧刻有卷叶云纹，碑额正中刻绘一方蟠龙牌位，牌位内双钩阴刻“敕赐”两个大字，碑面右列第一行竖书“梵净山重建金顶序”八字，左侧阴刻楷体碑文1349字，其中正文823字，附文516字。北京户部郎中李之彦撰写碑文，记述明神宗敕令钦命僧妙玄重建梵净山金顶之缘由，附刻太后娘娘李、太傅太师、太监、国子监、礼部尚书、户部郎中中央官员，贵州巡抚、巡按、总兵、布政、抚苗道省级官员，以及环梵净山诸府、县、司地方官员，并梵净山高僧、法徒共一百余人。该碑刻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百年屹立山巅，至今保存完好，是为梵净名山一大奇景，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梵净山《敕赐碑》^②。为完整理解该碑内容，特将该碑正文附录如下：

敕赐

梵净山重建金顶序

^{*} 贵州省哲学社科规划课题“梵净山弥勒道场的形成研究”[批号：11GZYB02]、贵州大学人文学院院级科研课题“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批号：2010RWYJ09]的研究成果。

^② 《敕赐碑》位于梵净山老金顶下之通明殿遗址旁，海拔2270米；1982年2月3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伏以四海名山，九州巨镇，十方净土，众姓福田。故东岱、西华、南衡、北常，悉帝王封禅之所；而玄寺、缙庐、青鸾、白马，皆佛子接引之区。水上闻香，始辟漕溪法界；空中飞锡，因开潜麓化城。山以仙名，地关人杰。窃见梵净山壁立黔南之境，轴连楚蜀之间。仙洞灵台，咸棋布而卢列；奇峰古刹，俱凤翥而鸾翔。天心池、金沙池、九龙池、倒泻银河，无异临海之桂鹤；太子石、青阳石、金子石，高标玉笋，不让陈仓之鸣鸡。独红云金顶为最奇，宜白莲社之茂建。雪消六月千溪涨洪溢江源；日转双峦万壑阴崇^①。翻经台下，时看百鸟衔花；选佛场中，更有群龙荫树。奈何羊肠荆棘，遂会虎观丘墟。九年之壁既颓，百神之觞安寄？宁惟游人断白芷之响，抑且景物负赤诚之霞。而请曰：肆今宇内提衡方岳者，金谓两间之巨镇，所以立天地而不毁，冠古今而独隆者，无如四大名山。而不知此黔中之胜地有古佛道场名曰梵净山者，则又天下众名岳之宗也！旧说者以弥勒、释迦二祖分管世界，用金刀劈破红云金顶，于是一山分为二山。是山也者，上之穹窿接天，而三十三天不为玄渺；下之厚重住地，而九十九京不为蚴蛸。虬螭结蟠，林木郁苍；剑气横天，仙梯接斗。叠经台、炼丹台，层峦耸翠；献果山、凤凰山，飞彩流丹。四时有不谢之花，缥缈然蓬莱三岛；八节有长生之景，炳炳兮阆苑瑶池。霞光万道笼金顶，普天圣真如云集；紫辉千丈罩玉门，率土明神似雨临。至若九十九溪一溪不知之说，尤见此山之广大；宝藏兴，货财殖，囊括天地之万有以为储。且夫崔崔巍巍以示其险，默令进香顶礼者履险如夷；巉巉岩岩以恶其势，阴使敬重三宝者率蒙善报。所谓大地乾坤，无边法界，极乐天宫乎？盖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盛而日新。久已灵驰于两京，倾动于十三布政，劳旌于抚按，频顾于道府；诸侯莫不期以魂交黄帝而梦接安期，古来得道成真，又莫不于斯凝神，于斯蜕颖。他如仙迹所遗，标题所载，种种灿著，难以殚述。既自播乱之后，传闻四方，往来朝覲人希，非复旧盛，倘亦佛老运数之厄使然！第此山之灵异，千载一日也。窃计世道之兴隆，佛神司命；而山岳之显爽，多自修培。幸际仁明在位，泽遍八方，恩施还定，百神是依，千载奇遇。以故天哀名山之颓，而赐以钦命僧妙玄重建金顶正殿，足为万圣临奎；蒙钦命抚按道府各衙门作兴允议然。而山连四府，当与国运俱隆。玉简金书，伫见人文并灿山灵。谨序。

赐进士第北京户部郎中李之彦谨题

太后娘娘李，太傅太师常乐，太监王，国子监林，礼部尚书张，户部郎中李，钦差巡抚贵州军门郭、张，巡按监察御史杨，钦差总镇都督邓、张，铜仁府知府陈、陈……

（后略）

大明万历戊午岁仲春吉旦

二、《敕赐碑》诸多问题研究

《敕赐碑》是贵州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佛教文物碑刻，对了解明代中央王朝与贵州少数民族的互动关系，明代在贵州正式建省和改土归流，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信仰世界，以及佛教在贵州的源流演变都具有非常重大的价值。本文从六个方面逐一进行考证，以期对明代贵州政治和梵净山佛教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思考和启示。

第一、“五溪蛮夷”与众神之山

仔细考察梵净山地区民族状况和文化传统，可知梵净山最初是作为“五溪蛮夷”众神之山而存在的，这在《敕赐碑》中有非常明显的介绍。《敕赐碑》称“仙洞灵台，咸棋布而卢列；

① 该句原缺三字。

奇峰古刹，俱凤翥而鸾翔’，“剑气横天，仙梯接斗”，“缥缈然蓬莱三岛，炳炳兮阆苑瑶池”，“普天圣真如云集，率土神明似雨临”，“他如仙迹所遗，标题所载，种种灿著，难以殚述”。此外，更以“天下众名岳之宗也”点眼之笔隆重表明梵净山之在全国名山之中的地位。梵净山是从“五溪蛮夷”的众神之山，发展到道教仙山，最后演变为佛教名山的。

梵净山是武陵主峰，五溪腹地，地理位置处于在湖北清江、湖南沅江、贵州乌江三江之间，不仅是古代“五溪蛮夷”的世居之地，而且也是两湖进入云南，巴蜀进入两广的交通咽喉。梵净山地区至今有28个少数民族居住，少数民族人口占铜仁地区总人口68.40%^①，其中土家、苗、侗、仡佬是该地区人口最多的四个少数民族。祖先崇拜、万物有灵、鬼神、巫教、傩戏等民间信仰仪式至今仍然盛行。因此，山王神、地母神、土地神、白虎神、雷公神、风神、树神、水神、洞神、傩公、傩母、石保爷，至今仍是该地区少数民族朝拜的重要神灵。巫师、鬼师、土老师，在村寨仍有一定地位。在梵净山朝山道上，山王庙、地母庙、土地庙、山神、树神、洞神，随处可见。笔记多次调查梵净山地区少数民族村寨，发现寺宇中各种民间神灵与佛主、菩萨一样都享受民众的供奉，甚至母猪也被塑成神像，称之为“母猪菩萨”，受到村民顶礼膜拜。

在梵净山地区的每一个少数民族村寨，都有一片茂密的树林，这是他们的神树林、护寨林。在梵净山西侧印江县永义乡昔土坝的朝山路旁，有一株27米高的唐代紫薇古树，已有1300余岁的树龄，被民众视为“神树”。在附近的朗溪镇爬山溪又有“打儿洞”，是善男信女请求洞神送子的地方。在梵净山最神圣的老金顶九皇洞（九皇殿），还塑有傩公傩母像。傩公衣冠楚楚，正襟危坐，而傩母却敞胸露乳、阴户洞开。这是土家、苗族等少数民族祈求自己的创世女神——傩母给予更多的子孙，保佑人丁兴旺、后嗣昌盛的地方，故香火最为鼎盛。

第二、道教仙山

梵净山也是道教问道求仙的地方。唐宋时期，道教已经传入梵净山核心地区，如宋代印江建有三清观^②，铜仁有“翁篷寨人杨再从，崇尚修炼^③。”松桃有“天龙相公，幼好道术……屡有灵异，至今土人虔祀之”。^④元代，铜仁建有铜佛寺，祀三个铜人，其中之一就是道教老子。降至明代，梵净山金盏坪、凤凰山、玉皇顶（老金顶）等都是问道求仙之士隐居修炼之地。如《铜仁府志》记载“杨琴光，隐于梵净山之金盏坪。”《江口县志稿》记载“凤凰山……相传古代讲吐纳术者卓锡于此，自梵净开山后，此山之名遂没。”梵净山老金顶又称为“玉皇顶”，在梵净山佛教兴起之前，原本是该山道教至高之地，至明代还保留有玉皇殿、三清殿等道教道观。万历间四十六年明神宗敕封的梵净山金顶五大古寺、六大古殿中，名列第二位的就是老金顶的三清殿^⑤，而老金顶巅峰的玉皇殿一直保存下来，在民国时期称“玉皇庙”；^⑥在印江自治县民族陈列馆，还收藏珍贵的古代《三清图》等道教文物多件。以上可见道教在梵净山影响之一斑。^⑦

至迟到明代中后期，佛教在梵净山已经占有绝对优势，成为佛教名山，如：万历元年（1573）金顶《院道》摩崖称梵净山“委系古迹名山”；万历四十六年《敕赐碑》称“古佛道

① 龙海碧等主编《铜仁地区志·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② 道光《印江县志》。

③ 嘉靖《贵州通志》。

④ 道光《松桃厅志》。

⑤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敕赐碑》。

⑥ 老金顶“玉皇庙”见崔成章《梵净山》，《中央日报》1940年9月8日版。

⑦ 更多资料请见赵平略《梵净山地区道教与佛教的融合》，《2004'中国梵净山佛教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4年。

场”。然而,明代梵净山仍可找到道教仙神的痕迹。《敕赐碑》没有回避道教在梵净山的影响,相反,还用“诸侯莫不期以魂交黄帝而梦接安期,古来得道成真,又莫不于斯凝神,于期脱颖”一句加以交代。考:安期,即安期生,古仙人,在东海蓬莱山居住,以巨枣为食,汉武帝曾派人访求之。梵净山不仅是“诸侯”期以“梦接安期”、“得道成真”的地方,也是民间人士访求羡门之术的地方。如明末抗清名臣、浙江诗人谢国梗抗清失败后就隐居梵净,专门讲求羡门修炼之术。《印江县志》记载“谢国梗……爱梵净山,居焉,得黄庭羡门之术,与人游,数日不食。”他还精通书法、制艺,因梵净山“值寇氛,卜居印江”,传授印江学子,周国栋等成为著名弟子。^① 谢国梗是为明末清初梵净山最著名的仙道人物。

第三,梵净山开辟和佛教名山的形成

《敕赐碑》载“盖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盛而日新。”但梵净山何时开辟?佛教何时传入?《敕赐碑》并未明确交待。故此问题历来都是梵净山佛教研究的一大悬案。

梵净山佛教传入有“五代说”、“隋唐说”、“北宋说”、“明初说”、“明万历说”,至今未有定论,^② 正如《松桃厅志》云“刻石文曰重修,则梵宇之来久也,惜未载明创始年代。”《松桃厅志》即是针对《敕赐碑》没有明确说明梵净山的创始年代而言的。笔者认为梵净山佛教始于北宋初年,故力主“北宋说”。^③

追溯梵净山佛教的传入必须联系贵州佛教渊源来考察。贵州佛教正式传入始于唐代,然梵净山佛教于唐代无考。至北宋初年,梵净山始有寺庙可考,即西岩寺。梵净山处于佛教传入贵州的两条主要通道——黔中牂牁道(乌江)和辰沅道(沅江)交汇处。唐代已有通道经梵净山连接牂牁、辰沅两道,故唐代在梵净山西侧建立思邛县。

至宋代,梵净山称思邛山,源于思邛山并经思邛县的河称“思邛江”(今印江河),在思邛县已兴建宋代西岩寺。西岩寺建于北宋乾德三年(965),距今已有1000余年历史,是梵净山核心地区最早一座寺庙,是为梵净山祖庭。^④ 《清一统志》载“西岩寺,在城西五里甲山寨下,宋时古刹。”宋代思邛县、思邛山、思邛江、西岩寺四位一体的格局,说明梵净山佛教在北宋初年已经正式传入并兴起。

元代,梵净山以东也有明确记载的佛教寺庙——铜佛寺(在今铜仁市)。至明初,梵净山以北又新建了梵净山地区第一座“天”字号寺庙——天马寺(在今松桃乌罗镇)。(道光《松桃厅志》载“天马寺……明洪武六年僧毁墨建。”(道光《天马寺碑》:“始祖宗安和尚,号自然。于洪武年间得创天马寺,荒田一段,周围老山一副,册载额粮一斗四升”。(万历《天马寺钟铭文》载“传始祖宗安和尚,号自然。”

由上述考证可知,在宋、元、明四百年间,梵净山至少已经修建西岩寺、铜佛寺、天马寺三大古寺,说明佛教在梵净山地区有持续而良好的发展。至明初,梵净山因梵宇林立,为梵天净土,正式得名“梵净山”。从宋代“思邛山”到明代“梵净山”名称的转变,标志梵净山佛教名山的正式形成。故至明代中叶,梵净山佛教已有四五百年历史,称其为“古迹名山”、^⑤ “古佛道场”,^⑥ 为清代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最终形成准备了有利条件。

① 道光《印江县志》卷六《人物志》。

② 梵净山佛教传入的争论,详见张明《2010中国梵净山弥勒道场金玉弥勒开光暨佛教学术研讨会综述》,《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1期。

③ 张明《梵净山佛教源流考》,《佛学研究》2005年第14期。

④ 西岩寺,《明一统志》、《清一统志》、《贵州通志》、《思南府志》、《印江县志》等有载。

⑤ 明万历元年(1573)金顶《院道》摩崖。

⑥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敕赐碑》。

第四、梵净山第一次重建（嘉靖末至万历中/约40年）

梵净山在明初已经兴盛，何以至明中叶嘉靖、隆庆之前却淹没无闻？仔细考明代梵净山佛教史，可知梵净山佛教从明初至隆庆间有百余年的明显断裂空白之处。其原因有二，第一，是明王朝在初期对佛教采取严厉的压制政策，正如陈垣先生在名著《明季滇黔佛教考》云“计明宣德以后、隆庆以前百余年间，教律净禅，皆声闻阒寂，全中土如此，不独滇黔然也。”^①。第二，是明王朝在梵净山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引发了一系列少数民族起义事件，使自宋、元、明初以来发展良好的梵净山佛教受到干扰而被迫中断。《敕赐碑》载“翻经台下，时看百鸟衔花；选佛场中，更有群龙荫树。奈何羊肠荆棘，遂会虎观丘墟。九年之壁既颓，百神之觞安寄？”所谓“羊肠荆棘”，“虎观丘墟”，正是关于第二点原因的非常隐晦的暗示，只是为明王朝在西南苗区的政策失误遮羞而已。

嘉靖年间的龙许保发动了明代贵州最大规模的苗民大起义，引起明王朝对梵净山地区的足够重视，因此明王朝在梵净山地区进行了三大调整：第一，移贵州总兵驻防铜仁，节制铜仁、镇筸两参将，统领湖广、贵州汉土官军，强化对苗族的军事高压统治。第二，由于明王朝因镇压起义而实力衰落，被迫改变军事战略，由“征剿”改为“围困”，即开始在梵净山以东“生苗”地区修建“边墙”，是为著名的“南方长城”。^②第三，加强佛教对少数民族的教化，借以将强悍的“生苗”转化为温顺的“化内之民”而成为“熟苗”。故在龙许保起义被平定之后，梵净山佛教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重建。

梵净山第一次重建为嘉靖三十九年至万历二十七年（1560——1599），历时四十年。此次重建，除重修西岩寺、天马寺之外，还新建孝慈寺（在合水）、回龙寺（在木黄）、天庆寺（在木社）。^③此外，金顶古茶殿、释迦殿、弥勒殿、三清殿等也重新修复。金顶《院道》摩崖（万历元年/1573）、天马寺铁钟（万历元年/1573）、护国寺石雕菩萨（万历三年/1575）、《剪刀峡摩崖》（万历十六年/1588）、河缝观音洞摩崖（万历二十四年/1596）等，都是梵净山第一次重建时珍贵的第一手文物史料和历史见证。从以上摩崖和铁钟铭文中可以看出，上至贵州巡抚蔡文、都清道曹、抚苗道杨、乌罗司长官杨、印江知县雷学皋都参与了梵净山佛教第一次重建活动。特别是印江知县雷学皋于万历元年招义民开砍剪刀峡朝山道，知县张镡于万历二十四年开凿河缝观音岩道，可知印江历届知县皆受命负责维护朝山道事宜。故印江善士杨洪德既见于金顶《院道》摩崖（1573），又见于《剪刀峡摩崖》（1588）；他在印江知县的任命之下，具体负责管理朝山道路至少有16年之久（1573——1588）。

梵净山第一次大规模重建，为梵净山“古迹名山”、“古佛道场”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故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名著《黔记》中说“贵州山以梵净山为第一，可比天台。”他将梵净山与佛教天台宗祖庭天台山相比，由此可见梵净山在第一次重建之后的兴盛状况于一斑。《敕赐碑》所载“盖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盛而日新”，至此可以无惑也。

第五、梵净山第二次重建（万历末年/约12年）

《敕赐碑》载“既自播乱之后，往来朝覩人稀，非复旧盛。”与第一次重建不同，《敕赐碑》明确说明了梵净山第二次重建的原因乃是因为播州之乱。播州之乱是播州土司杨应龙于明万历中叶发动的明代最大规模的土司叛乱，与戚继光东南沿海抗倭战争、明朝与后金在东北的战争同为明末三大战役。三大战役消耗了明朝的国库积蓄和兵力，加速了明朝的必然灭亡的厄运。

①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一。

② 明代梵净山以东围困“生苗”的“边墙”在清代继续重建使用，至民国初年“革屯运动”最终废除。

③ 道光《印江县志》。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明王朝命四川总督兼巡抚李化龙、贵州巡抚郭子章、蜀将刘健等调集三省24万官军、分八路进剿播州。杨应龙退守海龙囤,最后自焚,播州之乱平定。播州之乱对贵州的直接影响是再次引起了少数民族起义。正如《明史》所载“自杨应龙平后,销兵太多,苗仲所在为寇^①”。仅梵净山地区而言,苗民乘机起义。《明史》载“其在水碓山,介于铜仁、思、石者,曰山苗,红苗之羽翼也,窥自平播后财力弹竭,有轻汉心,经年剽掠无虚日。”^②万历三十年,巡抚郭子章镇压杨应龙之后,即赴梵净山苗区“躬率部署”。万历三十四年(1606),郭子章征梵净山水碓山苗。“乃命总兵陈璘,参政洪澄源率官军五千,益以土兵五千,攻水碓山。监军布政使赵健率宣慰土兵万人,使游击刘岳等督之。及两路会师,皆九十余日而克。”^③但苗民并未征服,仍然是明朝的严重的南部边患,故郭子章的继任者贵州巡抚张鹤鸣上奏称“又有红苗,环铜仁、石阡、思州、思南四郡,数几十万;而镇远、清平间,大江、小江、九股诸种,皆(杨)应龙遗孽,众万余。臣部率止万三千,何以御贼。”^④

如何医治战争创伤?如何安抚边地苗民?成为明王朝和地方统治者面临的严峻问题。佛教无疑是成本较少而功效较高的选择。正如贵州总兵陈汝忠^⑤在《重修木桶观音阁碑记》中说“苗喜劫杀,好杀戮。彼大士者,西方上人也,恶争禁杀,一以无争为教。吾从而事之,焉知彼苗僚者不闻大士之风而变于汉乎?未必于岩邑无补也。”^⑥因此,播州之乱和水碓山苗被平定之后(1599—1606),明王朝在梵净山苗区大力推行佛教,加强佛教的教化作用,由此揭开了梵净山第二次重建的序幕。

万历四十六年(1618),明神宗敕封加冕梵净山佛教,成为梵净山第二次重建的点眼之笔。《敕赐碑》载“帝追尺一为建刹”,“以故天哀名山之颓,而赐以钦命僧妙玄重建金顶正殿。”明神宗皇帝降旨重建梵净山金顶,令妙玄为钦命僧,各级官员亲往督查重建,北京户部郎中李之彦撰《敕赐碑》。计此次重建有钦命僧一人、高僧五人、法徒三十四人;重建五寺、一洞、六殿。^⑦其中,老金顶古茶殿被敕封为“敕赐圣旨承恩寺”,称“金顶正殿”,寺内供奉“当今皇帝万万岁”牌位一方。一洞、六殿分布于正殿左右,拱护正殿肘腋,世称“脚庵”。天庆寺、朝天寺、天林寺、天池寺扼四方朝山大道,称“四大丛林”,^⑧金顶正殿和四大丛林都带有“天”或“恩”字样,以示天子的浩荡皇恩。北京户部郎中李之彦前往传达圣旨,为边远苗疆的梵净山寺庙增加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威严的神圣色彩。梵净山敕赐修葺一新的五寺、一洞、六殿,奠定梵净山“一大正殿,四大皇庵,四十八大脚庵”的格局。此次重建,因惠沾皇恩,梵净山之名遂播于宇内,香火盛极一时,《敕赐碑》称“所谓古梵净鼎而新焉。”铜仁诗人张简臣《尖岩望梵净山》以“藐尔嵩华泰岱千万言”句赞梵净雄奇,喻政《登梵净山》则以“古殿灯燃长白昼,危楼钟动欲黄昏”句志其朝拜之盛。

在此,《敕赐碑》又一问题常被人们提及:明神宗的生母李太后早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二月驾崩,^⑨何以在四年之后的《敕赐碑》上还刻有“太后娘娘李”?仔细研究《敕赐碑》,可以发现除李太后之外,还有一些省、道、府、县官员早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已经离任,但

① 《明史》卷二百五十七《张鹤鸣传》。

②③④ 《明史·贵州土司》“新添条”。

⑤ 陈汝忠,浙江上虞人,锦衣卫,万历二十一年(1596)任贵州总兵,驻铜仁。

⑥ 万历《铜仁府志》。

⑦ 五寺、一洞、六殿,见《敕赐碑》,分别为:承恩寺、天庆寺、朝天寺、天林寺、天池寺、九皇洞、九皇殿、三清殿、圆通殿、弥勒殿、释迦殿、通明殿。

⑧ (清)印江诗人廖云鹏《重登梵净山迭韵》有“红云盖顶展高眸,四大丛林望里收”句。见廖云鹏《花山投戈集》,原件收藏于印江县档案馆。

⑨ 《明史》卷一百十四《后妃二》。

仍然与后任官员并列其上。如“钦差巡抚贵州军门郭、张”：郭，郭子章，江西泰和人，进士，万历二十七年至三十六年（1599—1608）任贵州巡抚，已离任。“巡按监察御史杨”：杨，杨鹤，湖广武陵人，进士，万历四十三至四十四年（1615—1616）任巡按贵州监察御史，已离任。“钦差总镇都督邓、张”：邓，邓钟，福建晋江人，武进士，万历三十八年（1610）任贵州总兵，已离任。“钦差分巡抚苗道刘、高”：刘，刘观光，广东南海人，万历四十年任贵州按察司佥事，已离任。“铜仁府知府陈、陈”：前者陈，陈以耀，江西人，举人，万历四十三年任，已离任。“思南府知府舒、陆”：舒，舒应凤，广西全州人，举人，万历三十九年任，已离任。“印江知县郑”：郑，郑继绪，广西人，举人，万历二十一年任，已离任。由此可见，《敕赐碑》只是万历四十六年第二次大规模重建完成之年的皇家庆贺之宝，而重建活动不可能在当年完成，其过程当有数年或十余年之久，故前后参与重建的官员当名列其上，以示功不可忘。考梵净山此间适宜重建的安定时间当在播州之乱和水碾山苗已经平定之后的万历三十四年（1606）以后。由此推知，梵净山第二次重建为万历三十四年至四十六年（1606—1618）之间，历时共有12年之久，与《敕赐碑》所载多位离任官员的任期完全符合。

第六，钦命僧妙玄的来历、法派与归宿

钦命僧妙玄是梵净山乃至贵州佛教史上最重要的高僧，被称为梵净山“至尊”和“重辟之祖”，其子孙在梵净山传七代之久，跨越明清两代。梵净山在明万历、清康熙年间两次受到敕封加冕，妙玄功莫大焉。然而，妙玄却是梵净山最具有神秘谜团的高僧，^①其来历、法派，以及最终归宿至今尚无人进行考证。本文试作粗浅考证，以解妙玄三大谜团。

第一、妙玄来历 《敕赐碑》称“幸际仁明在位，泽遍八方，恩施还定，百神是依，千载奇遇。以故天哀名山之颓，而赐以钦命僧妙玄重建金顶正殿，足为万圣临銮。”这是妙玄来历的最权威证据，即妙玄是受到明神宗钦命而重建梵净的。故梵净山《九皇洞碑》称妙玄为“至尊”，并记载了“至尊”在梵净山修持的情况。《九皇洞碑》云“至尊……赖佛而修，或焚香火，或寂静，或讽诵，或持密咒……精进持戒……或在岩穴，或在古洞，或餐疏相食……或饥馁数日，如重耳在宋，孔子在陈，伯夷在首阳山无异也……”该碑将妙玄在梵净山隐居和修炼的真实情况描述得具体而生动。此外，《脉源宗谱碑记》中也明确记载妙玄的身份是明神宗国舅，他先隐居梵净山，因被地方官员发现汇报朝廷，故受明神宗敕赐而重建梵净山佛教。《脉源宗谱碑记》载“故明舅李妙玄……妙玄为神宗椒房雁字，心厌荣宠，喜浮屠者，遂隐于黔思铜之深麓，因见其山幽异峭拔迥常，审之古迹，乃得山名为梵净也。已而为当道者觉以状奏闻，帝追尺一为建刹，所谓古梵净鼎而新焉。”由此可知，妙玄乃是姓李，系神宗之国舅，因心厌荣宠，喜好浮屠，遂隐居于梵净山。“已而为当道者觉以状奏闻”一句非常关键，一个“觉”字将妙玄的重要身份揭示无遗。梵净山历来隐居之士较多，唯独妙玄“为当道者觉”，并“以状奏闻”，没有重大的身份来历，是不会惊动“当道者”上奏朝廷的。皇帝对妙玄敕封加冕，命重建梵净古刹，于是“古梵净鼎而新焉”。妙玄是为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第一大功臣。

第二，妙玄法派：在《脉源宗谱碑记》中，明确记载了妙玄十六字派为“智慧清净，道德圆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妙玄系共有七代子孙，跨越明清两代，从“圆”传到“寂”字辈，他们在梵净山多处碑刻中均有名可查。妙玄系的十六字派与元末明初高僧宝金碧峰的法派完

① 妙玄之谜在2010年中国梵净山佛教研讨会上有热烈争论，详见张明《2010'中国梵净山弥勒道场“金玉弥勒开光仪式暨佛教文化研讨会”综述》，《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1期。

全一致。宝金碧峰主派法脉有四十八字,^①后被其后代子孙不断敷衍和续号,或者重复使用。宝金碧峰下第七世湘西龙标山突空智板禅师(临济下二十五世)的十六字派即系宝金碧峰法派前十六字的重复使用。梵净山与龙标山距离不远,故妙玄的法派当从龙标山突空智板传入。突空智板为“智”字辈,妙玄距突空智板六个字辈,当为“德”字辈。突空智板为临济第二十五世,则妙玄当为临济第三十世。由此可见,妙玄所传乃是宝金碧峰——突空智板的法系,^②因此,梵净山佛教是中国佛教临济宗的重要一支。《脉源宗谱碑记》载“凡滇、黔、楚、蜀之人,无不争趋朝覲,自明迄今,逾有百载”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即说明了梵净山是中国南方佛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南方僧众不远千里前来朝拜。

第三,妙玄归宿:在《脉源宗谱碑记》中记载了妙玄下历祖墓地,但并未记有妙玄的墓地,造成今人关于妙玄归宿的迷惑。其实,关于妙玄在梵净山的归宿,《九皇洞碑》已有交待,只是该碑文世人知者不多,故未受到足够研究。《九皇洞碑》载“至尊……终有败坏……十方贵官长者,化银于本寺”,由此可以窥知妙玄寂于梵净山,十方贵官长者膜拜的信息。此外,《脉源宗谱碑记》也明确记载妙玄圆寂于梵净山“妙玄师寂后,传嗣彻空圆通。”彻空圆通是妙玄系第二世,是当年妙玄重建梵净山的得力助手。在《敕赐碑》所列五大化主中,第一位便是圆通和尚。笔者多年访求,终得圆通和尚墓铭,知圆通和尚生于明隆庆己巳年(三年/1569年),卒于明崇祯乙亥年(八年/1635年),在世66年。《九皇洞碑》当是圆通和尚为其师妙玄所刻的。现有足够碑刻和文献证明妙玄圆寂于梵净山九皇洞,而且其肉身一直保持到民国年间,长达300年之久。作者尚有专文深入考证妙玄肉身情况,此不赘述。

三、结 论

《敕赐碑》是梵净山历史上最重要的佛教碑刻文物,但在地方史志和私人诗文中只有零星提及,其碑文并未收录进任何正式文献之中。故该碑能完整保存至今,弥足珍贵。《敕赐碑》透露了明万历以前梵净山地区历史文化变迁、少数民族传统信仰结构、梵净山佛教源流以及兴衰演变等诸多信息。本文通过对《敕赐碑》的考证和研究,并结合其他史志和碑刻相互印证,初步弄清了梵净山从众神之山、到道教仙山、到佛教名山的演进过程,梵净山佛教传入和开辟之谜,明季两次重建,以及钦命僧妙玄的来历、法派和归宿等问题。本文特别指出:梵净山作为贵州第一佛教名山和西南佛教胜地,是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必然结果。明朝中央和地方统治者文武兼施,一方面采取武力镇压,一方面借用佛教加强教化作用,对梵净山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大力推行佛教,并以皇家之敕令加封于大明边地苗疆之寺庙,最终为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形成提供重大契机,而转圜此契机之关键人物是为钦命僧妙玄。妙玄不愧是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最大功臣,而《敕赐碑》因透露众多历史信息,故可视为梵净山镇山之宝。

(责任编辑:黄夏年)

① 宝金碧峰主派法脉四十八字为:智慧清静,道德圆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心源广续,本觉昌隆;能仁圣果,常演宽弘;惟传法印,证悟会融;坚持戒定,永继祖宗。参见黄夏年《贵州〈梵净山天池院海阔慧惺禅师正觉塔铭〉与〈脉源宗谱碑记〉研究》,2010年8月“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研讨会论文”主题发言论文,载《梵天佛地——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240-261页。

② 具体考证见黄夏年《贵州〈梵净山天池院海阔慧惺禅师正觉塔铭〉与〈脉源宗谱碑记〉研究》,同上。